

王水照蘇軾研究四種

蘇軾研究

王水照 著

中華書局



蘇軾研究

王水照 著

王水照蘇軾研究四種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蘇軾研究/王水照著. —北京:中華書局,2015.5
(王水照蘇軾研究四種)
ISBN 978-7-101-10677-0

I.蘇… II.王… III.蘇軾(1036~1101)-人物研究-文集
IV.K825.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10141 號

書 名 蘇軾研究
著 者 王水照
叢 書 名 王水照蘇軾研究四種
責任編輯 彭 偉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12 $\frac{7}{8}$ 插頁 2 字數 350 千字
印 數 1-2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0677-0
定 價 55.00 元



王水照，浙江餘姚人，1934年7月生。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後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調入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1998年任復旦大學首席教授。現任復旦大學文科特聘資深教授，中文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宋代文學學會會長、《文學遺產》顧問、《新宋學》主編等職。著述豐厚，所撰著作獲省部級、國家級優秀成果獎多項，是當代宋代文學研究的奠基者與拓荒者之一，2012年獲上海市學術貢獻獎。

主要著述一覽表：

- 《蘇軾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版
- 《唐宋文學論集》，齊魯書社，1984年7月版
- 《蘇軾えのひとと文學》，日本東京日中出版社，1986年6月版
- 《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 《蘇軾論稿》，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12月版
- 《宋代文學通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版
- 《王水照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版
- 《蘇軾傳》(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 《中國文豪蘇東坡》，韓國漢城月印出版社，2001年4月版
- 《歷代文話》，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 《宋刊孤本三蘇溫公山谷集六種》，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總序

我與蘇軾研究結緣，起因於那特殊年代的幾次特殊機遇。1958年暑假，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同學響應當年“大躍進”的號召，決定自己動手編寫一部文學史，挾持“學術大批判”的狂飆，聲言要把“紅旗”插上中國文學史的領域。其時課堂教學中，還剛剛學完唐代文學，我却被編入宋元文學寫作組，開始接觸蘇軾作品。在那個對古人粗暴批判、對老師批判粗暴的風潮中，寫成的兩卷本“紅皮”文學史却獲得巨大的聲譽，同學們頗有自豪感。然而次年政策調整，糾正“大批判”中的過“左”傾向，於是我們又作全面修改，出版了四卷本的“黃皮”文學史，向正常的學術書寫稍作回歸。1960年，我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又參加另一部《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再次承擔了蘇軾一章的寫作。三次修“史”標誌着我蘇軾研究的起步，甚至也可以說是問學之途的發軔。

然而，這一“起步”却充滿惶惑、遺憾乃至悔恨，其教訓比經驗更多、更深刻，給我以長遠的影響。特別是“紅皮”文學史的寫作，使我們處於既熱情亢奮又思想僵化、馴化的矛盾交集之中，隨着時間的推移，也逐漸體會到堅守主體意識的重要。蘇軾那首《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中的“楊花”，被作者的生花妙筆，賦予了活生生的生命。她漫天飛舞，姿態變幻，自以為充滿活力和情思，殊不知全是受外力之“風”驅遣的結果。我讀楊花詞就每每有種

身不由己的悲哀。由此提醒自己：為時裹挾，望風落筆是學人的大忌，初步認識到獨立思考、保持自我是學術創新的根本。當然，這一“起步”也並非都是負面的。尤其是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那段編寫文學史經歷，應該說受到了頗為嚴格的學術訓練和學術規範、良好學風的自律教育。開始懂得文獻資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礎和前提，而作家的創作文本更是研究某位作家最重要、最核心的材料。正是閱讀了蘇軾的全部詩詞作品、大部分文章及其他背景材料，才對蘇軾有了一點自己的看法，並養成了強烈的讀蘇興趣，為今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引導我繼續走向“蘇海”。

對歷史人物進行個案研究，通常採用專題論析、作品解讀、人物傳記、作家年譜等著述體裁，以期從多種角度、不同層面來展示歷史人物的真實全貌。這是一種有效的、便於操作的方法。朱東潤先生研究宋代梅堯臣、陸游，分別貢獻了三部著作，即《梅堯臣傳》、《梅堯臣集編年校注》、《梅堯臣詩選》和《陸游傳》、《陸游研究》、《陸游選集》，並能彼此互闡，相得益彰，在方法論上有示範意義。這裏匯集我的有關蘇軾著述四種，即《蘇軾研究》、《蘇軾選集》、《蘇軾傳稿》、《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也不外乎上述的著述體裁範圍，編成叢書，似略示系統性。其實，這原不是預先有意的策劃和設計，而是自然形成的。或出於出版社的約稿，或受新資料發現的啟發與推動。現將四種著述情況向讀者作個簡單的交代。

《蘇軾研究》是一部論文集，除作為“代序”的《走近“蘇海”》外，共收文二十三篇，分作“綜論篇”、“思想篇”、“品評篇”、“影響篇”、“譜學篇”五個專題，而對研究對象蘇軾而言，則經歷了從政治家蘇軾到文學家蘇軾再到作為士大夫精英型範蘇軾的演化過程，這與我國國內蘇軾研究的動向幾乎同步，也可說是與時俱進吧。學術工作者不論秉持何種立場和主張，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

代的影響，但“與時俱進”與“為時裹挾”是有本質區別的。區別即在於能否堅持自我意識與獨立思考。這些論文都寫作於1978年“新時期”以後，表達的是個人認真研究後的一些心得，錯誤則自然難免，期待讀者教正。

《蘇軾選集》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叢書之一，是對蘇軾創作文本的解讀。這套叢書給予選註者以較大的編寫自由，允許在一般選本的字句訓釋、典故介紹等之外，自行設計欄目，我就按需要添置“評箋”、“附錄”等類（這套叢書中後出的選本多循此例），似能擴大文獻面，增強學術性，成為一般讀者和蘇學專家都可參閱的讀本。但仍存在不少缺失，此次重印，儘量作了彌補與修訂。

《蘇軾傳稿》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之一，屬於普及性讀物。全書篇幅不大，以蘇軾一生的文學道路為敘述的中心線索，重點較為突出。我曾與兩位門人分別合作過《蘇軾傳：智者之苦難中的超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初版，2008年再版）和《蘇軾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兩部傳記，前者展示蘇軾豐富多彩、跌宕起伏的人生，努力於學術性與大眾閱讀的結合；後者對蘇軾的文化創造和歷史功績進行全面論析和深入闡釋，較富學術內蘊。此兩部傳記主要是合作者的勞績，不宜收入本叢刊，讀者如有興趣，當可參閱。本書有日文、韓文兩種譯本，曾引起日、韓兩國報刊的關注。2013年9月，韓文版修訂重印，據韓譯者的統計，共有十六家韓國媒體作過報導，實出乎我的意料。“蘇子文章海外聞”（高麗朝權適詩）、“文章傳世帶方州”（蘇頌詩，漢江古名帶水），說明蘇軾的文學魅力几百年來至今不衰。

《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的編輯，乃是緣於我在日本講學期間發現兩種稀見的宋人所撰蘇譜，即何掄《眉陽三蘇先生年譜》、

施宿《東坡先生年譜》。這兩部書不僅編撰時間早，而且保留不少珍貴的蘇軾背景資料。因與其他三種宋人所撰者合刊一集，以見今存全部宋人蘇譜，當有裨於蘇軾研究。何、施兩種年譜國內久佚，重新引進中土，為國內學術界所矚目，“讀蘇者為之驚喜不已”（孔凡禮先生《蘇軾年譜自序》）。

以上四種拙著以叢書形式再版，算是我個人治蘇道路的小結。事實上，“蘇海”的博大，遠非這幾種著述形式可以涵蓋，倘若天假以年，我仍有興趣在此領域繼續耕耘。

王水照

2014年10月

走近“蘇海”

——蘇軾研究的幾點反思

近二十年來的蘇軾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宋代作家研究中可謂獨佔鰲頭。中華書局陸續出版了《蘇軾詩集》（1982）、《蘇軾文集》（1986）、《蘇軾資料彙編》（1994），最近問世的孔凡禮先生百萬字的《蘇軾年譜》（1998），又為蘇軾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性文獻資料。1980年成立的全國蘇軾學會，在組織和推動研究上也發揮了良好作用，先後出版過《蘇軾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6輯，1980）、《東坡詞論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東坡詩論叢》（同上，1983）、《東坡文論叢》（同上，1986）、《東坡研究論叢》（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論蘇軾嶺南詩及其他》（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紀念蘇軾貶儋八百九十週年學術討論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全國第八次蘇軾研討會論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中國第十屆蘇軾研討會論文集》（齊魯書社，1999）等重要論文集。我們還擁有一批有質量的學術專著和論文。至於普及性的蘇詩、蘇詞、蘇文選本更是不可勝舉。要之，在基礎性資料建設、理論性闡釋探討、鑒賞評析性推介等不同層面上，均有顯著業績可述，在不算興盛發達的宋代文學研究中，也許算得上一道頗有亮色的學術風景綫。

然而，處於世紀之交的歷史時刻，對這一研究領域進行回顧與前瞻，我們仍感差距甚遠，深感與研究對象本身所具有的研究價值

與意義頗不相稱。蘇軾是我國文化史上一位罕見的全才，是人類知識和才華發展到某方面極限的化身。人們對蘇軾所創造的文化世界，曾有“蘇海”之稱。雖然最早宋人李塗的提法是“韓如海”、“蘇如潮”（《文章精義》），但嗣後人們却習稱“蘇海韓潮”。韓文公的“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撐挾於天地之間”（司空圖《題柳集後》），以“潮”作喻，至為恰當；而蘇軾的文化世界，非大海之廣不足以言其“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呂氏童蒙訓》），非大海之深不足以言其“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宋孝宗《御制文忠蘇軾文集贊并序》），“蘇海”遂成定評。清代注釋蘇詩的一位大家王文誥，在他的《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完稿後，續有所得，編為五卷，即以“蘇海識餘”標題。他說，“蘇海之說舊矣”，以此寓含“汪洋渺瀰、橫無涯際，觀於海者，亦足致朝宗之意焉”。甚至連俞樾對“蘇海”表示過“誤矣”之指責（《茶香室叢鈔》卷八），也未能改變這一評價。蘇軾的詩、詞、文、賦、書、畫等皆足名家，都是宋代文學藝術中的標志性成果。陳師道說：“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後山詩話》）。以作家姓氏冠於“詩”字前，組成專門術語，在中國詩歌史上，除“陶詩”、“杜詩”、“韓詩”外，蘇軾也獲此不可多得的光榮，昭示其詩歌創作的獨創性與典範意義。面對這位海涵地負、千匯萬狀的一代文宗，我們的確應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更上層樓，提供出整體性的綜合研究成果。其次，蘇軾又是一位複雜而難以評論的作家，在他身上存在着不少研究難點，同時也往往成為論爭的熱點和焦點。如政治態度的變法與反變法，思想上的儒釋道關係，創作分期的劃分，文化性格的特質和核心，這些已經或正在討論的問題以及還將提出的諸多問題，就其繁多和複雜而言，在我國古代作家個案研究中也是較為少見的。這些問題的存在，正是“東坡世界”包孕豐富、深刻的必然反映，也是學術探討與發展的最佳生長點，研究者大有用武之地。第三，在我國古代作家

中，能够持久地跟同時和後世人們建立起親切動人關係者並不多，蘇軾却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李白的天馬行空、脫略羈絆，固然使人心折傾倒，但不免太高太遠，難以企及；杜甫忠愍誠篤，感時傷世，人們不能無動於衷，但學起來又太難太苦，蘇軾則是現世性與超越性水乳交融在一起的一位智者。他總是擁有一代又一代的衆多讀者、研究者和文藝家，引起他們連綿不斷的文化懷念，形成了一部以審美陶冶、理性闡釋和創作滋養為內容的蘇學接受史，並一直延伸到今天。在時下商品大潮汹涌的環境中，蘇軾的全部文化創造並沒有失去它的價值和作用。固然，這種作用不是也不可能是急功近利式的，毋庸說是一種無用之用。而無用之用正是一種大用，它是能够成為當代文化資源的組成部分的。對於蘇軾文化遺產的當下意義和現代轉換，也有待於研究者們的共同探索。

翁方綱不止一次地說到，“蘇學盛於北，景行遺山仰”（《齋中與友論詩》），“有宋南渡以後，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石洲詩話》卷五）。他所謂的“蘇學”似主要指蘇詩而言。我們不妨接過這一概念，用以規劃和設計蘇軾研究的整體格局，力求研究的系統性與嚴整化，以爭取蘇軾研究的更大突破。譬如說，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可否出版一套蘇學研究叢書，不僅可以涉及蘇軾文學方面的種種貢獻，也可涉及諸如蘇軾與黨爭，蘇軾與文學結盟，蘇學接受史乃至蘇軾在日本、在朝鮮等專題；一部翔實全面的蘇軾大傳也是人們久所期盼的。我們不想與批評專書方面的“龍學”、小說方面的“紅學”等顯學相攀比，但展望新世紀的蘇軾研究，懷有這一設想，大概不算奢望吧。

在我有限的專業範圍內，蘇軾研究始終是關注的一個課題。但多年來所獲寥寥，乏善可陳。謹將幾點感想略述如次，以向學術同道請益。

一是應重視“小環境”和具體事件的實證研究。人類的精神

生活是與整個外部環境互動互攝的心智活動，作家的文化創造不可能在完全封閉的內心世界中孤立地進行。我們走近“蘇海”，就應努力縮短古與今的時間隔閡，追蹤和品味蘇軾的生活遭際與心靈律動，重視他的文化創造與外部環境、人文生態的密切關係。所謂外部環境，主要自然是宋代的政治狀況、經濟形態、文化思想、士風民俗等“大環境”，更應從其具體的生存方式，如人際關係、交游酬和、家居生活、行跡細節等“小環境”入手，纔能獲得更切實的認識和透徹的理解。這也是糾正目前某些空疏浮淺、大而無當的學風的良藥。近讀一些蘇學論著，從正反兩方面引發我這點想法。

如對文學羣體的關注，是不少學者所選取的研究視角，確能收到過分局限於單個作家研究所不能得到的效果。在“蘇門”研究中，關於《西園雅集圖》真偽之爭，就是一個饒有興味的題目。從這個美術史問題中，可以挖掘出對蘇軾研究頗有意義的內容和史料。我看到的有四篇長文，即（一）美國梁莊愛論（Ellen Laing）《“西園雅集”與〈西園雅集圖〉考》（載《朵雲》1991年1期）；（二）上海徐建融《“西園雅集”與美術史學——對一種個案研究方法的批判》（載《朵雲》1993年4期）；（三）臺灣衣若芬《一樁歷史的公案——“西園雅集”》（載臺灣《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第10期，1997年3月）；（四）香港楊鍾基《蘇軾西園雅集考辨》（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6期，1997年）。此四文都涉及三個爭論之點：歷史上是否發生過蘇軾等16人雅集於西園之事？李公麟是否畫過《西園雅集圖》？今存《西園雅集圖記》是否為米芾所作？對此我不敢妄予判斷。但上述四文均為取材豐贍、梳理細緻、考據謹嚴的力作，却又觀點對立或有差異，倒有不少發人深思之處。從事件而言，蘇軾等16人可能不會在元祐時同一天集會於一處，因其時有的畫上人物不在汴京，但諸文引用的大量材料表明，當時蘇門文酒詩會之活動十分頻繁，王詵家的園苑之勝

聞名遐邇，更成爲蘇門的重要活動中心，也是我們研究蘇門的一個極好窗口。從李公麟作畫而言，雖在北宋文獻中尚未見有關信息，但從南宋樓鑰《跋王都尉湘鄉小景》（《攻媿集》卷七七）：“頃見《雅集圖》，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焉”，說明已有蘇門聚會的《雅集圖》；劉克莊《鄭德言書畫·西園雅集圖》在言及其友鄭德言所藏《西園雅集圖》時亦有“比之龍眠墨本”之語（《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四），已透露出李公麟確有墨本《西園雅集圖》之作，至少劉克莊是如此認定的。從北宋到南宋，文獻材料之所以由晦而顯，疑與元祐黨人一案有關。“蘇門”大都屬元祐黨人。米芾《西園雅集圖記》所列的16人中，就有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李之儀、王欽臣等8人名列元祐黨人碑，有所諱飾，自屬情理之中。因此遽然否認李公麟作此圖，指爲“子虛烏有”，是缺乏說服力的。而從研究蘇門的角度來看，此圖乃是一種藝術創作，它不是對蘇軾等16人某次聚會的照相式的如實記錄，而是把蘇門聚會時常有的或揮毫，或作畫，或聽彈阮琴，或題石，或討論佛理（畫面即分此五個單元）的場景藝術地再現出來。它形象有力地說明蘇門乃一才俊雲集、精英如林的人才網絡結構，顯示出蘇門成員之間高品位的文化交流水平。據傳古代不少小說家進行創作時，往往先從人物畫像中汲取靈感；小說之所以流行綉像本，也爲使讀者從直觀形象中引起遐想。研究蘇門，此圖（現存有兩幅傳爲北宋的畫作，另一幅爲南宋馬遠所仿作）實是一幅不可多得的藝術寫真，使研究者置身於鮮活的歷史生活情景之中。研究者也需要一點想象力。再從《西園雅集圖記》而言，雖然遲至明代始見稱引，至清初始見全文，但細按全篇，並無作僞破綻（稱蘇軾爲“東坡先生”，自稱“米元章”，不能作爲證僞依據）。在目前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僞的情況下，仍不失爲一篇描述蘇門的精彩而有內容的文字，真實地傳達出蘇門的羣體氛圍，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即使

以後有材料證明此文確非米芾所作，但偽作仍有不偽之處，並不完全失去其研究價值。〔謝巍《中國畫學著作、史實考證四則》（載《朵雲》1998年12月），其中有《米芾〈西園雅集圖記〉考》一則，列舉更多材料，證明“西園雅集”其事、其畫、其記三者，並非“理想”或偽作，對米芾《西園雅集圖記》與鄭天民《述古圖記》之關係，亦有頗為合理的推斷，以此論證《西園雅集圖記》非偽，可供參酌。〕另據梁氏考察，歷代著錄《西園雅集圖》畫作共有47幅，她還見到過存世的《西園雅集圖》41幅，共計88幅；衣若芬女士說，她“所見又不只於此”。“西園雅集”已成為美術史中一個摹本仿本不絕、久盛不衰的題材。這也是非常特殊的現象。衣若芬女士說得好，“不論‘西園雅集’是真實歷史事件或者全為虛構都不妨礙後人對它的向望”，應從其“歷史文化特質”方面加以探討。這是一個很有開拓性的文化研究視野。我覺得，蘇門的全面狀況乃至蘇軾被後代所接受的詳細過程，均可從圍繞《西園雅集圖》的繼續探討中，從某一方面或角度，得到更深入切實的闡述。

我還很有興趣地讀了鮑志成《高麗寺與高麗王子》（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一書。1996年2月，杭州西湖筲箕灣花家山莊施工現場出土一尊圓雕石像。據該書作者考證，其地為宋代高麗寺（慧因寺）遺址，此石像像主乃當時任杭州知州的蘇軾，他是作為護法神被塑像供奉於寺內伽藍殿的。作者所搜集的大量資料和頗稱嚴密的論證，對認識蘇軾的某一方面是很有意義的。我在《論蘇軾的高麗觀》中也已論及（已收入本書），蘇軾曾先後向朝廷上書七篇奏議，反對密切宋朝與高麗的外交關係，所討論的問題亦與鮑書相涉。元豐八年，高麗僧統義天訪華巡禮，問道於杭州慧因寺淨源法師，研習華嚴教義，由蘇軾友人楊傑館伴。蘇軾曾作《送楊傑》詩，對義天此舉尚採取友善歡迎態度。到了元祐四年，義天因淨源已圓寂，派遣其徒壽介等三人前來祭奠，時任知州的蘇軾却激

烈反對。從這裏可以看出蘇軾對待對外文化交流與外交關係，持有迥異的立場。此中緣由，拙文已有分析。讀了鮑文後又發現後一事件中還存在種種問題點：（一）蘇軾在《論高麗進奉第二狀》中，指責淨源“本是庸人”，而實際上淨源是當時華嚴宗的“中興教主”，被尊為華嚴宗的七祖或十祖。華嚴宗在唐代會昌法難以後，經論散失；至宋，淨源是繼其師子璿之後振興華嚴的最重要法師。且義天此次攜來華嚴散佚疏鈔向淨源求教，回國後又送來金書《華嚴經》三種譯本 180 卷，淨源特建華嚴閣安置。後又奉命正式把慧因寺改名為教寺，成為弘揚華嚴的道場，慧因寺又有高麗寺之稱。（二）蘇軾本人長期染指佛學，對華嚴宗尤有偏嗜。孔武仲《謁蘇子瞻因寄》（《宗伯集》卷三）詩云：“華嚴長者貌古奇，紫瞳燁燁雙秀眉。”他稱蘇軾為“華嚴長者”，使我們聯想到五代時名僧懷洞，他因“弘華嚴之教”而“河朔緇素尊事之”，被稱為“老華嚴”。（南宋曉瑩《雲臥紀談》卷下）蘇軾詩文中與華嚴關涉因緣者多多。詩如《和子由四首·送春》“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送劉寺丞赴餘姚》“手香新寫《法界觀》”，前者向蘇轍索看《華嚴經·法界觀》，後者稱贊劉搆手寫《華嚴經》81 卷之舉。文如《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叙》：“聰又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為蘊廬，而況書、詩與琴乎！”《跋王氏華嚴經解》提到《華嚴》有 80 卷，對王安石“獨解其一”表示異疑，均為體會有得之語。惠洪《冷齋夜話》卷五，評蘇詩“如《華嚴經》舉因知果，譬如蓮花，方其吐華，而果具蕊中”。指出蘇詩與《華嚴經》的相通之處。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中亦云：“滔滔汨汨說去，一轉便見主意，《南華》、《華嚴》最長於此。東坡古詩慣用其法”，提出蘇詩（特別是七古）之渾浩流轉之風與《華嚴經》之一致；劉氏在《游藝約言》中還補充說：“東坡詩字字華嚴法界。華嚴界一謂清涼界，坡所謂‘讀

我壁間詩，清涼洗煩煎’是也。”唐華嚴宗五祖之一的澄觀，曾得德宗“清涼法師”之號，此處劉氏又謂蘇詩之境界與華嚴宗相通。

(三) 蘇軾直至晚年，仍堅持抵制高麗進奉的一貫立場。寫於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付僧惠誠游吳中代書十二》(《東坡志林》卷二)中云：“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辯蜂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蓋其才有過人者。”“予方請其事於朝”，即指他《論高麗進奉狀》事；“夷僧”指壽介等三人。這則材料揭示了蘇軾當年曾指派思義去應對、監視壽介的重要情節，同時表明他直到晚年仍不改初衷，對自己此舉津津樂道。我想借鮑志成先生文章提出的問題是：如果從解開以上種種矛盾點出發，再進一步地探討蘇軾的信仰生活及其與政治等的關係，對深入認識他的思想面貌或許會有所助益的。至於蘇軾身後流傳的他充當“伽藍護法神”的故事，那是屬於蘇軾接受史的問題，但蘇軾本人是不會同意充當的，這也是一個頗為耐人尋思的現象。

胡適在 1932 年的《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句十分醒目的話：“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裏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問題意識”確是治學的要領。在蘇軾研究中，與其簡單重複一些老生常談的大題目，不如切實地開掘出一批富有學術內涵的中、小型課題，有根有據地予以研討與闡明，必能提高我們研究的總體水平。

二是對新材料的挖掘和鑒別。材料是一切研究的基礎和前提，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本世紀的幾次重大學術突破都導源於新材料的重大發現，甲骨、敦煌寶藏的重見天日，舉世震驚；《宋會要輯稿》的面世，也給宋代文史研究帶來深廣影響。就蘇軾研究而言，其最基本的材料，如作品、生平傳記等背景資料，應該說已大致完備，但也不是說沒有再發現的可能。如本書的“譜學篇”中有